人間佛教的演變與發展:從惠能、太虛到巨贊法師

劉振仁*

摘要

「人間佛教」強調佛教要貼近現實社會,關注現實人生;佛教徒應修成完善的人格,具備精博的佛學和科學知識,參加社會工作,在日常行事上學習菩薩行,犧牲自我、救世救人,進而開創出人間淨土。其根源最早可追溯到禪宗六祖惠能大師(638--713)。20世紀30年代,太虛和尚的「佛教革命」思想,開出了人間佛教建設的基本思路,由注重「死」的佛教轉向重「生」的佛教。但是因為太虛和尚的主張帶有濃厚的理想成分,且由於整個社會的發展問題,各種配套改革無法跟上腳步,無法形成力量。因此,後繼在大陸傳法的巨贊法師,主張佛教改革須著眼在「生產化」和「學術化」兩個目標上,並獲致钜大成果。巨贊法師是太虛人間佛教思想的堅決支持者,更是這一理念的闡發者。繼承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精神,不僅將佛法傳播在人間社會,且讓佛教能真正融入當代中國社會,完成佛教的中國化與現代化使命。

關鍵詞:人間佛教;惠能;太虛;巨贊法師

壹、前言

「人間佛教」一詞最早正式出現在 20 世紀 30 年代,由當時太虛和尚依據佛教的基本教理提出。「強調佛教要貼近現實社會,關注現實人生;佛教徒應修成完善的人格,具備精博的佛學和科學知識,參加社會工作,在日常行事上學習菩薩行,犧牲自我、救世救人,進而開創出人間淨土。」(李華華,2010,頁79) 然究其根源,最早卻可追溯到禪宗六祖惠能大師(638--713)時期。惠能大師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人物。在惠能大師之前,包括禪宗在內的中國佛教各宗派,都將追求出離生死、超脫輪回以達到涅槃寂靜,當作人的一生最終之修

收件: 2025/6/20。同意刊登: 2025/7/7。

^{*}韶關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本論文經兩位雙向匿名審查通過。

行目標(繆方明,2010,頁 63-64)。惠能大師之後,將此種出世的理念實踐,轉化為個人主體在人間社會,成就自身佛道的個體實現。換言之,惠能大師的佛教中國化,即是將成佛的道路,轉化為帶有中國傳統儒家「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聖賢之道。其作法理念如「即心即佛」、「即性即佛」、「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等都是。此等思維,使得人間佛教的意蘊,在當時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得以彰顯。

清末民初,隨著中國內憂外患,各種局勢變化加劇。政治上主張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如火如荼般地展開;而這種革命氛圍,亦傳播到以佛教為首的宗教界身上。當時,伴隨著孫文「三民主義」學說出現,後繼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將佛教革命思潮推向高潮,佛教救世的思想因運而生。把佛教「應用」在佛教應世、救世和自身改革的層面之上,可名之為「改革型佛教革命」。當時的太虛和尚及其佛學救世思想,就是此一思潮之中心(李向平,2002,頁 46)。強調佛教不可自絕於社會之外,要貼近現實,關注現實社會人生;佛教徒須具備精博的佛學和科學知識,參加社會工作,在日常行事上學習菩薩行,以完美人格犧牲自我、濟世救人,創造人間淨土(李華華,2010,頁 80)。作為當時佛教改革的著名領袖,太虛和尚的「人間佛教」思想,深深影響著當時的中國社會。只是由於其理念過於先進,無法符合當時社會的需要。所以,人間佛教的具體化與完善,要到後來分別在海峽兩岸傳法的印順法師、巨贊法師的倡導實踐,才算真正得到落實。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國共內戰隨之爆發。不同於印順法師跟隨國民政府來臺,相對地,作為太虛和尚的弟子之一的巨贊法師,選擇留在大陸。身為「現代新佛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在人間佛教的理念與實踐上,不僅承襲太虛和尚的主張;而且在其基礎上,更提出許多與時俱進的觀念與作為。正如大陸學者的讚言:「巨贊法師是改革浪潮的浪尖兒,太虛路線的繼承者,他在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為了佛教的複興和改革,殫思竭慮,勇猛直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奉獻了一生。」(朱哲,2001,頁 2)巨贊法師根據對佛教教理的深入研究,以及對佛教和社會現狀的了解,面對當時中國大陸佛教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經常思考如何結合社會實際,實現太虛和尚提出的佛教教育與制度改革的問題。巨贊法師後來撰寫一系列文章,有系統地闡述其革新思想體系(陳衛華、鄧子美,2009,頁 105)。對當時及後來人間

佛教與佛教中國化,有其一定正面積極的意義與貢獻。以下本文就從《壇經》、 《太虛大師全書》、《巨贊法師文集》及多方搜集到的資料,分析比較歸納後, 提出有關從惠能、太虛到巨贊法師之人間佛教的發展及演變情況。

貳、六祖惠能的人間佛教理念與主張

佛教能夠成為影響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的最重要宗教之一,其關鍵因素就是佛教與中國的文化、社會實現了高度的融合。其中,禪宗是佛教中國化、入世化的重要角色;把佛教的終極理想,從「佛國彼岸」返照回到現實人間。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弘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教化宗旨,最能體現佛教中國化的意涵,是「人間佛教」的先聲(李明軒,2019,頁39)。

六祖惠能大師的人間佛教觀,見於《六祖壇經》(簡稱《壇經》)一書。 根據《壇經》所示:在其思想中,惠能大師認為「人性」之盡善就是「佛性」, 指出「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佛性」是人最根本的本質,亦即人人天 生具有成佛的本性。只是,人雖有佛性,在現實生活中,卻又不是佛或難以成 佛,是因為人的「迷悟不同。」「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如能「見 性」,發覺自性,就能成佛,修行的真義目的也在此(雷茜之,2020,頁 197)。惠能大師在《壇經》中,從「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出發,強調人性之體 即佛性的佛性論,肯定人在佛法實踐中的主體地位。惠能大師所帶動佛教中國 化的變革,在意義上可以說是近代人間佛教的思想源頭(李明軒,2019,頁 40)。

《壇經》有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宗寶本壇經,1983,頁 351 下頁)觀諸現在對人間佛教的理解,惠能大師特別主張在人間現實社會,以大乘菩薩道為旨歸,踐行五戒十善,淨化自性,廣修四攝六度,利益眾生,進而關懷社會、淨化社會。提倡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道德修行與人間關懷,最終目的乃是構建佛教所提倡的「利樂有情,莊嚴國土」,實現人間淨土的理想(趙樸初,1983,頁 18)。人間淨土就是人間佛教的展現。《壇經》中的人間淨土描述,主要集中於〈疑問第三〉韋刺史與六祖惠能大師的對話。其內容簡述如下:

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

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 師言:「... 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宗寶本壇經,1983,頁352上-中)

上述《壇經》所提修行要領:斷十惡除八邪、修十善,常行慈悲喜捨、平直,做到破除世人的我執、法執;如能內外明澈,則西方淨土自然現前。惠能大師以大乘頓教法門的「慈悲、喜舍、清淨、平直」來譬喻「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的德行,用來對治世人心中的「人我心、邪崇心、煩惱心、毒害心,虛妄心、塵勞心、貪嗔心、愚癡心」。最後還說:「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凡此種種,均可視為太虛和尚「人間佛教」的先驅。對此,太虛和尚曾評價說:「自有六祖,則中國一切從梵文譯來的經典,向來在文字或思想上有隔膜的,不能體貼消化的,都可以融會貫通;從此,佛法與中國人的心理不發生絲毫的障礙,深深地契合和相應,流演於後世,沒有文字語言上的障礙,也沒有心理思想上的隔膜。故由六祖,才把佛教的真髓深深地打入中國人的心坎中。」(太虛法師,2005,頁 21)此言甚是公允,也為太虛和尚的「人間佛教」主張,找到思想上的脈絡源流。

參、太虛和尚的人間佛教論

有別於傳統佛教的方丈叢林,人間佛教的概念,乃是一種入世的修行觀。 換言之,佛法不是高高在上、與世隔絕的一種教理產物,想反地,是一種契合 當時中國社會需要,與民間文化結合、利己利人、與人為善,與時俱進的進步 實踐理念主張。

持平而論,自明末以來,中國的佛教已經慢慢走向沒落。時間演變至近現代,20世紀清末民初的中國佛教,面對外力的沖擊,制度老舊、思想保守,無法因應當時社會的需要。因此,許多佛教僧侶對此現象,紛紛提出眾多改革主張與構想。太虛和尚(1890--1947)就是影響後來最深且鉅的其中一位。

「人間佛教」一詞出現的時間雖晚,但是根據現有文獻指出:1913年太虛和尚提出佛教革命主張時,人間佛教的思想就已在他腦海裏面萌芽(鄧子美,1994,頁 68)。在當年追悼寄禪和尚的法會上,太虛和尚提出三種革命:「教理的革命」、「教制的革命」和「教產的革命」。這些內容,幾乎都與後來的「人間佛教」主張一致,可以視為「人間佛教」的發端。其中,在教理革命上,太虛和尚認為:今後的佛教應該多注意現實的問題,應該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進步。其作法包括有: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

戒十善為人生基本道德的善行,以此努力改善國家、完善社會制度、增進人們 的互敬互助,進而美化人生;提出應發揮人生本有性能、人人都能成佛的觀 點,以引導佛教的人間化發展。把這種佛教內容概括為人生的佛學,後發展為 人生佛教進而人間佛教,成為現代中國佛教發展的指導思想。

關於教制的革命,太虛認為佛教的組織(僧伽制度)需進行改革。對此, 太虛和尚後來撰寫《整理僧伽制度論》,闡述了改革佛教制度的系統設想,主要 包括:一、主張改革出家人的僧團生活,使其能夠真正主持佛教,用佛教的精 神救世救人;二、主張組織正信會,使佛法深入並永駐人間。

在教產的革命上,太虛主張對佛教長期以來的經濟制度、 財產制度進行改革。認為寺院私有財產應成為十方僧眾公有; 寺院財產主要用以興辦佛教教育事業以培養佛教青年僧才,舉辦社會慈善事業以擴大佛教的社會影響、改良佛教的社會形象。

在上述三種佛教革命中,太虛和尚認為:「教制革命」是重點所在。只有改革傳統,建立適應現代社會的僧伽制度,培養合理的僧伽人才,才能保證「教理革命」「教產革命」順利進行(曾豔陽,2010,頁48)。

因此,太虚和尚的「佛教革命」思想,開展了人間佛教建設的基本思路,即由注重「死」的佛教轉向重「生」的佛教。並以人生佛教為根本,整理僧伽制度,以此團結佛教信眾,使世間大眾皆能融洽於佛教的十善信仰之中。因此,太虚和尚的教制改革構想,就是為佛教進入社會而做出的組織建設的制度設計(趙翠翠、李向平,2015,頁116)。

1928年4月,太虚和尚發表《對於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文中正式提出「人生佛教」一詞,究其內容與後來的人間佛教主張大體上相同。其中對佛教建設提出以下主張:「甲、依三民主義文化,建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國僧寺制;丙、收新化舊成中國大乘人生的信眾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印順,1995,頁 128)由上述觀點可知,這些立論與 1913年太虚和尚提出佛教革命主張時相同。唯一差別者,僅在於「人生佛教」一詞的正式提出。

「人生佛教」強調佛教要以人為中心。佛教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如何使 人生活得有意義、有價值。佛教並不是空談清修,反而著重於解決人生的現實 問題。 當然,太虛和尚認為人生最大的意義與價值,仍是在學習佛法,使人不 斷向上進步,乃至成菩薩成佛。上述這種佛教便是「人生佛教」。只是,其主張進步之處在於:太虛和尚強調,要修成完善的人格,向上增進,仍須從一個正常人的日常生活做起。「所謂學佛先從做人起,學成了一個完善的好人,然後才談得上學佛。」(太虛,1970a,頁521)

在此基礎上,太虛和尚認為:學菩薩行要從現實生活中做起,把學菩薩的活動買穿於日常生活中去。「今菩薩行的實行者,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優良的佛學和科學知識,參加社會各部門的工作。」(太虛,1970b,頁30)太虛和尚將佛教徒的人格、學識,以及提升參加社會工作的生活方式,視為佛教復興的重要因素來看待。強調佛法不是頓入空門、不理世事的與世隔絕生活,反倒是一種具備新時代意涵,教人向上提升、精進、勞動的精神心態。這種關懷人間、將自身投入庶民社會的修行觀,有別於中國傳統以往的宗教立場,而此正是太虛和尚「人間佛教」思想的重要體現。

1933 年 10 月,太虚和尚於漢口發表《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的演講。明確指出:「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裏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太虚,1970c,頁 431)從最初的佛學革命主張,到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提出,象徵著太虚和尚在此一思想方面的成熟;另方面,也意味其主張的具體化與成熟化。有關這一部分,可以從太虚和尚在 1940 年夏天在漢藏教理院的講演中,得到印證(羅同兵,2003,頁 85)。

後來在巨贊法師等人的持續帶領下,藉由這一連串不斷的改革與發展,「人間佛教」的理念與主張,逐漸形成一股無法抵擋的風潮,深刻影響後續佛教僧人、居士、社會大眾的佛學觀與修行觀。後來,更在海峽兩岸各自形成影響力與話語權,連結民間信仰與文化,讓兩岸人民不管在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如何? 在宗教信仰的情感交流上,卻是始終沒有改變。

肆、巨贊法師對人間佛教的詮釋與發揚

在《建設人間淨土論》一文中,太虛和尚主張必須在日用行事上,學習大乘菩薩積極救世的精神,實現人間淨土。作為當時佛教改革的著名領袖,太虛和尚的「人間佛教」思想影響到不少青年佛教徒,巨贊法師(1908-1984)便是其中的一位。巨贊法師「早年追隨太虛法師,鼓吹佛教革新運動;亦曾秘密參加革命工作,可謂一革命僧人。」(李向平,2002,頁54)根據巨贊法師自

述:俗名潘楚桐,江陰澄江貫莊村人。年幼就想出家。1931年,經由太虛和尚介紹,皈依靈隱寺卻非和尚出家。巨贊法師進入佛門之後,曾在閩南佛學院及漢藏教理院等任教,深深認同太虛和尚倡導的佛教革命運動,特別是對「人間佛教」的理念有所領悟(巨贊,1950a;吳志雲主編,2000,頁702-721)。

巨贊法師認為,自清末以來佛教長期的發展困境,其根本原因在於佛教內部的腐朽混亂:如佛教徒素質的低劣、戒律與清規的廢弛、叢林管理的混亂,以及整個社會自利風氣的改變等。故要徹底解決上述的問題,不能僅從佛教自身出發,還要著眼於社會現實,使佛法的弘揚與整個社會的進程一致才行。這種論點明顯與太虛和尚「人間佛教」的主張不謀而合,更反映出巨贊法師一生憂國憂教的人格特質(李華華,2010,頁80)。

身為「革命僧人」,巨贊法師一向秉持改革進步的思想觀,且用實際行動來實踐其「人間佛教」的思想與主張。秉持「人間佛教」的改革精神,巨贊法師抱持大乘菩薩行的作為。「所謂大乘菩薩行,是在生死苦難中,煩惱紛擾中開展出來的。也就是把人家當作自己,從為人的工作中充實自己。所以大乘菩薩深入群眾,隨眾生投入驢胎馬腹都可以。」(巨贊,1950a;吳志雲主編,2000,頁730)

在實際行動上,巨贊法師用通俗語言將佛理與時代背景緊密結合。如在愛國愛教上:巨贊法師在抗日戰爭時期,用《獅子吼》雜誌鼓勵佛教徒參與抗戰;此外,更和一些人士先後組織成立了佛教青年服務團、南嶽佛道救難協會、湖南佛教徒抗敵後援會等團體,開展愛國救亡的宣傳活動、募捐公演活動,舉行超度陣亡將士的法事活動等。後來,共產中國成立,其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通過《現代佛學》、《法音》等雜志,動員佛教徒做過一些具體的行動。這些當然有其政治上的意涵與目的,但從某種角度來看,巨贊法師的確是一個行動主義者,也是一位人間佛教的實踐者。這些舉措,依據大陸學者記載,如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通過主持佛教界的抗美援朝座談會、領導北京市佛教界的愛國示威遊行等活動,倡議中國佛教徒以實際行動去保家衛國等(李華華,2010,頁80)。而在共黨統治下,巨贊法師為了使佛教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他更強調:廣大佛教徒要認真學習國家政策,響應政府號召,積極進行思想改造,加強佛教的溝通和交流等(李華華,2010,頁81)。我人先不管其立場對錯如何?由上面那些作為想法來看,巨贊法師確實是一個與時俱進者。憂國憂民且持續進行佛教改革,使佛教僧侶的思想,徹底脫離傳統封建社會色國憂民且持續進行佛教改革,使佛教僧侶的思想,徹底脫離傳統封建社會色

彩;在無法出世隱匿的情況下,主張大陸的佛教徒,必須以精進的修行為人民服務,完全具有切合時代、福國利民、有益社會的明顯特色(巨贊,1950a;吳志雲主編,2000,頁731))。

詳言之,在承襲發揚太虛和尚的「人間佛教」的思想與主張上,20世紀40年代時,巨贊法師就對太虛的僧制改革方案,提出更進步的前瞻性實踐主張。 巨贊法師認為:太虛和尚的許多主張帶有濃厚的理想成分,由於整個社會的進程問題,各種社會配套改革無法跟上腳步,只靠少數僧人的力量,無法在扭轉形勢、形成力量。因此,主張改革僧團制度應該建立在「生產化」和「學術化」兩個目標上(趙翠翠、李向平,2015,頁117)。

巨贊法師的「生產化」,是指僧徒各盡所能、生活自給,也就是僧徒採取直接參與勞動生產的方式。有利於促進佛教界生產事業的發展,培養僧尼在實踐中的團結協作精神,為佛教的生存與改革開創廣闊的獨立空間。其理念可以追溯到百丈懷海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理之上(普濟,1984,頁136)。依據巨贊法師的具體構想,一方面利用寺廟附近的山地開闢農林場,組織僧尼開展生產勞動,實現佛教僧徒的自養;另一方面,可以開辦佛教實業。寺廟的收入除了維持僧尼生活的費用之外,其餘費用則匯集起來,舉辦大規模的慈善事業和佛教事業,如佛教工廠、佛教醫院、佛教教養院、佛教大學等(趙翠翠、李向平,2015,頁117)。

此外,與佛教「生產化」目標相配合的,則是佛教「學術化」的主張,即要使每一個寺廟僧團都能夠建設成為學術團體,而每一個和尚都應該是文化人。巨贊法師希望佛教界要發揚印度那爛陀寺的學術精神,提高僧眾的知識水准,恢複僧眾在學術界原有的地位。巨贊法師認為,佛法的弘揚和佛教改革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佛教徒的文化素質。身為「革命僧人」,巨贊法師在繼承太虛和尚佛教改革思想上,進一步提出更系統性的僧伽制度改革。整頓寺院,積極培養僧侶人才,提高佛教徒素質。此一理念在抗戰時期取得一定的成效。如倡議成立廣西桂平縣佛教會,會址設在桂平西山龍華寺,並把西山半山窩的李公祠和水月宮改為居士林,附設五明圖書館。用自己講學所得經費在桂平西山下創辦了「女子佛學研究班」,講授文化知識和佛學課程等(趙翠翠、李向平,2015,頁118)。

因為太虛和尚的早逝,導致無法將其人間佛教的理念落實到社會大眾層面。但其理論思想,卻在其死後,分別在兩岸得到發揚。以大陸那方面來說,

在共產中國成立後,巨贊法師曾上書毛澤東和各民主黨派,持續其以「生產 化」和「學術化」為目標的改革佛教理念,得到多方贊成和同情。此後,巨贊 法師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佛教的重建。在整理佛教組織,培養佛教人才,提高佛 教徒素質方面,巨贊法師做出很多努力,也得到鉅大的成效跟回響。

如在推動佛教組織的建立上:巨贊秉持人間佛教契理契機原則,在不違反佛教立場,又不違背中共政府政策的前提下,對舊佛教進行全面整理。後來,經過多方努力,1953年中國(大陸)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巨贊法師被選為副秘書長。1957年,被增選為中國(大陸)佛協副會長,成為佛協核心領導成員之一。中國(大陸)佛協成立後,作為全國佛教界的協調機構,為大陸佛教的穩定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國土地改革的背景下,通過寺院生產化,解決當時許多經濟上的問題(巨贊,1950a;吳志雲主編,2000,頁702-721)。

其次,在加強對佛教徒的改造方面:巨贊法師配合當時大陸政府政策,認 為此一階段改革佛教的重點,在於對佛教徒的改造。他一直強調:整理佛教首 先要革除追求安逸享受,脫離社會、遠離民眾的弊病。要培養佛教徒深入社 會、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疾苦、解除群眾苦難的精神(巨贊,1941;吳志雲主 編,2000,頁661)。為此,巨贊法師在北京成立了佛教徒學習會和僧尼訓練 班,「提高僧尼們的政治覺悟和對於佛教的體認,使能從工作中實踐佛教的真精 神,增進修養。」(巨贊,1952;吳志雲主編,2000,頁757)

秉持人間佛教理念,持續佛教改革的「生產化」目標。巨贊法師強調:僧尼除了是遵守佛教戒律的佛教徒外,又是社會的一員,必須兼負勞動生產者的角色。必須發揚百丈「農禪並舉」的傳統 ,讓僧尼從事生產,使僧尼們參加勞動生產,達到自養自給、豐衣足食以配合國家生產建設。通過勞動,僧尼們可以真正融入社會,體味人間疾苦,發揚人間佛教的真精神。如 1950 年巨贊法師與周叔迦等人在北京開辦大雄麻袋廠,組織僧尼參加生產,不久各地寺僧紛紛響應,掀起生產熱潮,走上勞動自養道路(巨贊,1952;吳志雲主編,2000,頁 758)。這種生產自養的辦法,不僅安置大量僧尼,又服務社會,溝通了佛教徒與社會的聯繫,自利又利他的修行理念,充分體現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也完全吻合時代發展的需求,落實人間佛教的根本主張。

此外,巨贊法師在持續推動佛教改革的「學術化」目標上,首先,他創辦佛教刊物,溝通各界聯繫。共產中國建立之初,佛教徒思想混亂,無法適應社會劇變的狀況。巨贊法師與喜饒嘉措(1884-1968,藏傳佛教精神領袖之一)、

趙樸初等人,在 1950 年 6 月發起成立了現代佛學社,負責出版《現代佛學》月刊。該刊主要任務是「傳達(中共)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處理佛教問題的方針;用科學的歷史觀點,重行批判並確定佛學的真實價值之所在。……進而改革佛教現行的制度;聯繫國內外佛教徒,為爭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而努力。」(巨贊,1950b;吳志雲主編,頁 1220) 1953 年中國(大陸)佛教協會成立後,《現代佛學》成為其會刊,到 1964 年止,總共出版了 144 期。為推進佛學理論,尤其是人間佛教理論的發展,做出相當大的貢獻。

在上述作為外,為達到「學術化」的改革目標,早在 20 世紀 30-40 年代,巨贊法師就先後擔任過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佛學院的教師。這些都屬太虛和尚創辦或主持的佛學院,巨贊法師在這其中大力弘揚太虛首倡的人間佛教思想。要求學生勤讀佛書之餘,還要兼讀文史哲,要關心國家大事,閱讀報紙新聞,充分體 現了人間佛教的佛法不離世間的基本理念(陳衛華、鄧子美,2009,頁107)。

此外,在共產中國於大陸成立後,巨贊法師更是積極籌備建立佛學院。經過多方努力,1956年中國(大陸)佛學院在北京法源寺正式創立。喜饒嘉措任院長,巨贊任常務副院長。中國(大陸)佛學院成立之初,就確定主旨在培養「熱愛祖國、擁護和平、具足正信、能發揚佛教優秀傳統」的佛教人才。1956-1966年十年間,總共畢業了近400名學員,這些學員畢業後,大都成為各地佛教界的骨幹力量。為當時中國(大陸)佛教改革思想的傳播、人間佛教理念的實踐,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陳衛華、鄧子美,2009,頁108)。

總之,巨贊法師一生的際遇,因運而生。從追隨太虛和尚修學習佛,認同發揚太虛和尚的改革理念;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抗戰時期提出「生產化」、「學術化」的具體改革目標,替當時中國佛教界注入一股新生的革命力量。不同於印順法師隨著國府來台,巨贊法師選擇留在大陸。在共產中國建立後,為配合當時中共政府的政策,在當時社會、政治氛圍下,與時俱進;引領時代潮流,對中國(大陸)佛教進行改革,做出一定程度的貢獻。從某種程度來說,巨贊法師既是太虛和尚人間佛教思想的堅決支持者,也是這一理念在當時的闡發者。巨贊法師利用其在共產中國與社會各界的密切關係,維護佛教界應有權益。人間佛教思想能持續在大陸傳播發揚,巨贊法師有其一定的歷史定位。

伍、結語

「人間佛教」的理念,最早可追溯到禪宗六祖惠能大師時期。惠能大師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人物,在他之前,中國佛教各宗派,都將人生的終極目標,放在遙不可及的「寂滅為樂」境界。或是尋求往生西方極樂淨土,或是企盼早日悟空解脫。總之,當時佛教徒的目標,不在把握當下,而是在追求來生的永恆解脫。惠能大師之後,將出世的理念轉化為個人主體的明心見性。強調每個人如能自度自悟,人間淨土可見。此等想法蘊含當代人間佛教的理念,亦是佛教中國化的指標。

20 世紀初太虛和尚提出佛教革命主張時,人間佛教的思想就已在他腦海中萌芽。當時太虛和尚提出包括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產革命等三種革命。此等「佛教革命」思想,開啟了人間佛教建設的基本思路,即由注重「死」的佛教轉向重「生」的佛教;並以人生佛教為根本,整理僧伽制度,以此團結佛教信眾,並且將佛教徒的人格、學識,以及提升參加社會工作的生活方式,視為佛教復興的重要因素。強調佛法不是頓入空門、不理世事的與世隔絕,反倒是一種具備新時代意涵的生活方式,教人向上提升、精進、勞動的精神心態。

只是由於太虛和尚理念過於先進,無法符合當時社會之需要,加上其過世較早(1947年);所以,人間佛教的具體化與完善,要到後來的印順法師、巨贊法師這一代,才算真正落實。巨贊法師為太虛和尚的傑出弟子之一,身為「現代新佛學」的奠基人,在承襲發揚太虛和尚的「人間佛教」的思想與主張上,巨贊法師就對太虛的僧制改革方案,提出更進步的前瞻性實踐主張。認為太虛和尚的許多主張帶有濃厚的理想成分,由於整個社會的進程問題,各種社會配套改革無法跟上腳步,只靠少數僧人的力量,無法在扭轉形勢形成力量。因此,主張改革僧團制度應該建立在「生產化」和「學術化」兩個目標上。

後來,巨贊法師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佛教的重建。在整理佛教組織、培養佛教人才、提高佛教徒素質方面,巨贊法師做出很多努力,也得到鉅大的成效跟回響。

總之,巨贊法師既是太虛和尚人間佛教思想的堅決支持者,更是這一理念 的闡發者。繼承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精神,不僅將佛法傳播在人間社會,且讓佛 教能真正融入當代中國社會,完成佛教的中國化與現代化使命。人間佛教思想 能持續在大陸傳播發揚,巨贊法師功不可沒。

參考文獻

- [宋] 普濟編、蘇淵雷點校(1984)。五燈會元(上卷)。中華書局。
- [元] 宗寶(1990)。六祖壇經。載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8 冊。佛陀教育基金 會。
- 太 虚(1970a)。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載於太虛大師全書第2冊。太虛大師 全書影印委員會。
- 太 虚 (1970b)。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載於太虛大師全書第 35 冊。 太 虚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
- 太 虚 (1970c)。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載於太虛大師全書第 47 冊。太虛大師 全書影印委員會。
- 太 虚 (2005)。禪宗六祖與國民黨總理。載太虛大師全書第 27 卷。宗教文化出版社。
- 印 順(1995)。太虛大師年譜。宗教文化出版社。
- 巨 贊(1941)。佛教當前的一個嚴重問題。獅子吼月刊,1(5)(6)(7)。載於 吳志雲主編(2000)。巨贊文集(下)。江蘇古籍出版社。
- 巨 贊(1950a)。一年來工作的自白。現代佛學,1(1)(2)。載於吳志雲主編(2000)。巨贊文集(下)。江蘇古籍出版社。
- 巨 贊(1950b)。現代佛學社緣起。弘化月刊,6(111)。載於吳志雲主編(2000)。巨贊文集(下)。江蘇古籍出版社。。
- 巨 贊(1952)。略談佛教的前途。現代佛學,2(8)。載於吳志雲主編 (2000)。巨贊文集(下)。江蘇古籍出版社。
- 朱 哲(2001)。巨贊法師文集·序言(上編)。團結出版社。
- 李向平(2002)。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革命走向」—兼論「人間佛教」思潮的現代性問題。世界宗教研究,(3),42-56。
- 李明軒(2019)。《增經》中的人間佛教思想釋論。法音,(7),36-42。
- 李華華(2010)。巨贊對太虛「人間佛教」思想的實踐。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7(5),75-82。
- 陳衛華、鄧子美(2009)。巨贊法師的人間佛教理念與實踐。宗教研究,(4), 101-107。
- 曾豔陽(2010)。太虛「人間佛教」理念的提出及影響。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4),45-49。
- 趙翠翠、李向平(2015)。「人間佛教」的社會觀研究—以太虛 、巨贊和趙樸初 的佛教思想為中心。宗教研究,(1),112-118。
- 趙樸初(1983)。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一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法音,(6),15-19。
- 雷茜之(2020)。從《壇經》看禪宗思想的「體用」。中國佛學,(47), 194-201。

鄧子美(1994)。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一百年文化衝撞與交流。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

繆方明(2010)。禪宗的人間佛教思想簡論。中國宗教,(12),61-66。 羅同兵(2003)。太虛對中國佛教現代化道路的抉擇。巴蜀書社。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Buddhism:

From Huineng, Taixu to Master Juzan

C.-J. Liu*

Abstract

"Human Buddhism" emphasizes that Buddhism should be close to the real society and pay attention to real life; Buddhists should cultivate a perfect personality, have profound knowledge of Buddhism and science, take part in social work, learn Bodhisattva's behavior in daily activities, sacrifice themselves, save the world and others, and then create a pure land on earth. Its roots can be traced back to Master Huineng (638--713), the sixth patriarch of Zen Buddhism. In the 1930s, monk Taixu's thought of "Buddhist revolution" opened up the basic idea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Buddhism, from Buddhism that focused on "death" to Buddhism that focused on "life". However, because monk Taixu's idea has a strong ideal element, and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ociety, all kinds of supporting reforms can't keep up with the pace and form strength. Therefore, Master Juzan, who successfully preached the Dharma in mainland China, advocated that Buddhist reform should focus on the two goals of "production" and "academic", and achieved great results. Master Juzan is a firm supporter of Taixu's Buddhist thought, and he is also the expositor of this idea.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compassion and helping the world in Mahayana Buddhism not only spreads Buddhism in human society, but also enables

Buddhism to truly integrate into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nd accomplish the mission of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Buddhism.

Keywords: human Buddhism, Huineng, Too virtual, Master Juzan

The paper was published under two double-blind reviews.

Received: June 20, 2025. Accepted: July 7, 2025.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oguan University.